

文史考辨



吕洞宾籍贯诸说,实则只有“河中”和“岳阳”两说。除“东平”为吕氏郡望外,宋人所传“关西”“关右”“关中”“京兆”与“河中”说完全是一回事;“九江”“鄂州”与“岳阳”说也是一回事。唐代河中府是吕洞宾的真实籍贯,岳阳则是吕洞宾的出生地。据《吕让墓志》推算,吕洞宾当于公元820年(唐宪宗元和十五年),出生在其父鄂岳观察使任上。《辞海》称吕洞宾是唐末“京兆人”、生年为公元798年(唐德宗贞元十四年),均有误。



文化
茶座

曾国藩缘何 重家如国

□一苇

晚清中兴名臣、大儒曾国藩,离开这个世界已经一百多年了,但是他的故事尤其是家书家训,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。有不计其数的人在阅读,在研究,在传承他的家训。这是为什么呢?

听郇波教授讲《曾国藩家训》,笔者理解原因有三。其一,曾国藩人生的几个重要关头,他的家庭,准确地说是兄弟,起了重要的作用。正所谓“打虎亲兄弟,上阵父子兵”,曾国藩出道之始,朝廷对他并不是很信任,同僚更不是那么支持与配合。怎么办呢?曾国藩家里兄妹九人,他自己的亲兄弟就有四人,他只有求助于兄弟。在好几次重要的战争关头,均是他的亲兄弟带兵赶来,挽狂澜于既倒,扭转了战局,救了曾国藩的命。战争中,曾国藩有一个弟弟受伤为国捐躯。他的另一个弟弟曾国荃更是威名赫赫,立下了不世之功。

这些都让曾国藩深刻地认识到家庭对于一个人的重要意义。他曾经讲过,为官只是一阵子的事情,而传承良好的家风、培养贤良的后人,才是更重要的。为此,他以家书家训为载体,将自己的心血与关切一点点倾注到亲人身上,倾注到家庭里,收获了丰硕的成果。他的儿子曾纪泽是晚清著名的外交家,孙辈中在教育、文化、经济领域也颇多翘楚。曾国藩注重家风建设,取得了良好的效果。

其二,注重修身的曾国藩有治家的水平与意愿。有晚清大儒美誉的曾国藩,将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当成自己肩头的重要责任,尤其是在修身和齐家上,他更是做到了互为补益,相得益彰。他有个外号“曾三戒”,因为他对自己的生活起居有相当严苛的清规戒律。他从自己的生活入手,从自己的修为起步,将清规戒律融入家庭建设中,因而有了系统、全面、科学的家训。

其三,曾国藩通过家书家训的公开传播保护了自己。晚年的曾国藩权倾朝野,名重一时,朝廷内外对他羡慕嫉妒恨的人比比皆是,怎样躲过明枪暗箭,在官高位险的人生风浪中站稳脚跟?曾国藩将书写多年的家书家训刊印行世,以此袒露胸襟,告诉那些敌对者,自己对于权利、金钱、未来早已看破,且有着相当的定力与淡泊。以公开刊印发行的家书家训为工具,曾国藩实现了自己对朝廷的忠诚表白,对同僚与敌对势力表明了心迹,换来了宝贵的平安。

一百多年前,曾国藩在名满天下时,因病离世,实现了难得的重臣高位而得善终。如今,还有许许多多的人在研读曾氏家训,这证明了曾国藩家书家训的生命力,也证明了他悉心家风建设的正确性。家是最小国,有对于家的重视,才会有对于国的奉献。家与国,国与家,自古以来就是不可分割的共同体。让我们每个人都像曾国藩那样,热爱自己的小家,热爱自己的国家吧!

吕洞宾里籍生年新考(上)

□王雪樵

古代的神仙有两类:一类是人编的,一类是人变的。人杜撰编造的神仙,只有神格,没有人格,你说不出他是哪里人,父母是谁,生于何年何月,譬如玉皇大帝。人变的神仙,则除了神格还有人格,即成为神仙之前,还有真实的人生履历。道教神仙吕洞宾就属于这后一种。他是从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变而为神仙的,因而可以找到他的里籍、生年、身世、履历等。事实上,千余年来,道、俗两界一直有人在做这个工作。然而正由于他是“神仙”,虚无缥缈,幻化无穷,因而诸说不一,歧异纷呈,许多问题仍存在争议。关于他的里籍、生年,比较有代表性的说法见于《辞海》。《辞海》(上海辞书出版社,第六版,第1461页)“吕洞宾”条说:“吕洞宾(798~?)唐末道士。名喆(一作岩),以字行,号纯阳子。相传为京兆(治今西安)人,一作河中府(治今山西永济)人。”笔者以为,这里的说法有不尽妥善之处,兹就此作一探讨。

先说里籍

吕洞宾的神仙传说蓬起于宋代,关于其里籍亦众说纷纭。据统计,典籍记载共有九种说法:

一、关西说。《宋史·陈抟传》说:“关西逸人吕洞宾有剑术,百余岁而童颜,步履轻捷,顷刻数百里,世以为神仙。”

二、关右说。北宋王举《雅言系述》有吕洞宾传云,吕为“关右人,咸通初举进士不第”。王另有《雅言杂载》称,“吕仙翁名岩,字洞宾”“本关右人”。

三、关中说。北宋王旦、杨亿《国史》说:“关中逸人吕洞宾年百余岁,而状貌如婴儿,世传有剑术。”张方平《乐全集》亦说:“关中逸人有剑术,虽数百里,顷刻即至。”

四、京兆说。南宋吴曾《能改斋漫录》卷十八载岳州《吕洞宾自传》石刻说:“吾乃京兆人,唐末累举进士不第……”

五、河中说。北宋杨亿《谈苑》说:“洞宾自言吕渭之后,渭四子:温、恭、俭、让,让终于海州刺史,洞宾系出海州房。”范致明《岳阳风土记》则径直曰:“先生名岩,字洞宾,河中府人。”叶梦得《岩下放言》卷中说:“世传神仙吕洞宾名岩,洞宾其字也,唐吕渭之后。”

六、东平说。元赵道一《历世真仙体道通鉴》卷四十五:“先生吕岩字洞宾,号纯阳子,世传以为东平人。一云西京河南府蒲城县永乐镇人,即今河东河中府也。曾祖延之仕唐终浙东节度使,祖渭第进士……先生乃让之子也。”

七、岳阳说。南宋邵博《邵氏闻见后录》卷二十九说:“唐吕仙人故家岳阳,今其地名仙人村,吕姓尚多。”

八、九江说。南宋曾慥《集仙传》谓吕为“九江人”。

九、鄂州说。北宋王常《真一金丹诀》谓吕洞宾为“鄂州进士”,“经数举,不第其名”。

上述九说实际可分为三类。

一、“东平说”可单列一类。东平是吕氏的郡望,如柳宗元为吕温写的诔文即题曰《唐故衡州刺史东平吕君诔》,吕焯为其父吕让所写墓志铭亦题曰《东平吕府君墓志铭》,指的都是郡望,而不是籍贯。持“东平说”者也知道这一点,实际赞同“河中说”。因此所谓籍贯“东平说”,事实上是不存在的。

二、“岳阳说”“九江说”“鄂州说”可列为一类。“岳阳”宋代称岳州,地处洞庭湖畔。由于洞庭湖有湘水、资水、沅水、沔水、渐水、元水、辰水、叙水、酉水等九条江水汇入,故宋人将洞庭湖周边的岳州地区也称作“九江”。而宋代又设有鄂(州)岳(州)观察使,鄂州与岳州(九江)属于同一行政区域,因而三说实则为一说。元人苗善时《纯阳帝君神化妙通纪》一书说:“或疑各本所载帝君生所及居处不一,详推乃父仕宦迁移,又作者欲在本乡人物为美,是以差误不一。”故吕洞宾故里出现“岳阳说”“九江说”“鄂州说”,应该与此有关。

三、其余的“关西说”“关右说”“关中说”“京兆说”与“河中说”是一回事,属于真正的“籍贯”。

为什么这样讲呢?我们知道,明清以前人们所说的“关东、关西”“关内、关外”“关左、关右”,不是指今天的山海关,而是指函谷关。秦汉以前的函谷关在今天的三门峡市灵宝县西南,是春秋至西汉前期由秦地通向东方中原要道上的重要关口。汉武帝元鼎三年(前114),又将关址东迁三百里,建在今河南省新安县,仍称函谷关。故西汉以后的“关西、关右、关内”,理论上即应包括今河南西部、山西南部、陕西及甘肃大散关以东的广大地区。古河东一带亦因位于函谷关之西,被称作“关西”“关右”“关中”。

举例来说。关羽的部将周仓,是今平陆县西祁村人。《三国演义》第二十八回写两人见面之前,裴元绍向关羽介绍说:“有一关西人,姓周名仓……”周仓即被称作“关西人”。清人梁章钜《归田琐记》有“《关西故事》载‘蒲州解梁关公本不姓关’一节,讲关公少年时代在家乡除霸而后亡命的故事,而被冠以‘关西故事’。清末戊戌变法中,由山陕维新派人士成立的‘关西学会’,为首的是闻喜人杨深秀和陕西三原人宋伯鲁。可见历史上平陆、解梁、闻喜等地,都被视为‘关西’。故宋代人依照习俗,称河中府永乐镇人士吕洞宾为‘关西逸人’,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

而古人在地理上又以东为左,以西为右。故称山东为“山左”,山西为“山右”;函谷关以东称为“关左”,河中府在函谷关以西,当然可以称作“关右”了。柳宗元《送独孤申叔侍亲往河东序》就说:“河东,古吾土也。闻其间有条山、大河,气盖关左。”条山、大河气势压过了关左,“河东”即是“关右”不误。又宋张师正《倦游杂录》载曰:“关右人有作京师语者,俗谓之獠语,虽士大夫亦然。有太常博士杨献,河东人,作诗寄郡中密友,破题曰……”文中直称河东人杨献为“关右人”。因此,称吕洞宾为“关右人”,与称吕是“河中府永乐人”也是一回事。

说起“关中”,历史上有宽严不一多种说法,并非专指陕西长安附近的地方。晋潘岳《关中记》称:“东自函关,西至陇关,二关之间谓之关中。”河中府位于两关之间,故古人也有称河中府为“关中”的。即如上面所列,宋初学者杨亿,一面在他所撰写的《国史》中称吕洞宾为“关中逸人”,一面在《谈苑》中又说吕是河中人,是“吕渭之后”。可见他是把河中府看作“关中”一部分的。再如明代王世贞《宛委余编》谈到著名的蒲州桑落酒,也说过“名酒之最古者,关中之桑落也”,径直称蒲州为“关中”,也说明了这个问题。而更早见于史籍的,如《新唐书》卷一九九《刘冲传》载柳芳《论氏族》说:“关中亦号郡姓,韦、裴、柳、薛、杨、杜首之。此关西之望也。杨氏华阴,韦氏、杜氏皆京兆,裴氏柳氏薛氏皆河东。”《唐会要》卷三十六《氏族》亦有同样的记载。裴、柳、薛本河东郡姓,这里亦归于关中郡姓,可见唐代人是把河东亦划入“关中”的。

至于为什么称河中府人吕洞宾为“京兆人”,这要从宋朝的行政区划来说明。在一般人心目中,“京兆”是指长安,属陕西;而河中府则属于山西,两者好像不是一回事。但称吕为“关西人”“关右人”“关中人”“京兆人”的,都是宋代人。而河中府的永乐县,在宋代则降改为永乐镇,随河中府一道隶属于陕西路,而陕西路的治所又是在京兆府(今西安市)。由于这个原因,在宋代人们既可以称吕为陕西人,也可以以陕西路首府所在地指政区,称其为“京兆人”。犹如司马光是夏县人,因夏县宋代属陕西路陕州管辖,史书亦称其为“陕人”和“陕西人”。姚天福系稷山县人,因稷山县元代属晋宁路绛州管辖,而晋宁路治所在平阳府(今临汾市),故史书多称其为“平阳人”。辛亥元老景耀月是芮城人,1912年景代笔起草了孙中山大总统就职演说词,文采焕然,轰动全国,景则被柳亚子赞誉为“太原公子”。即如今天在外地称某人为“运城人”,很可能他只是运城市所属某县的人,而未必就一定是运城城里人一样。尤其是在远离本土的地方,往往难免出现这种“大而化之”的表述。所以《辞海》称吕洞宾“相传为京兆人”“一说为河中府人”,在宋代可以说是一回事,在唐代是不能这样讲的。

纵观以上诸说,人们可能会提出一个问题:为什么宋代人都以“关”来指称河东呢?这是因为,历史上各个朝代称说地名,都是“就近取譬”,以当时都城所在地为坐标中心,而以附近名山大川、雄关巨邑为参照系。因此,同一个地方不同时代就有不同的名称。例如,汉、唐两代建都于长安,从长安往东,首先看到的是黄河,故以黄河为参照,称运城地区为“河东”;明、清建都于北京,从北京往西,看到的是太行山,故以太行山为参照,称包括运城地区在内的晋地为“山西”;北宋建都于汴梁,从汴梁往西,最有名的地标是古函谷关,故以函谷关为参照,又称运城地区为“关西”“关右”“关中”等。总之,理清了古地名命名的原则和方法,许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。